中外交流理论与实践

# 南洋华人移民史的影像转译:侨乡电影的文化记忆书写

王昌松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 43900)

**摘 要**:南洋华人移民史在跨国迁徙与离散经验中逐渐由历史事实转化为文化记忆,并在华文文学与华语影像中被持续叙述与重构。本文以“影像转译”为核心概念,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和电影理论,考察侨乡电影如何通过空间影像化、情感结构建构与符号再编码,将移民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表达。研究指出,侨乡电影在不同文化位置的创作者共同参与下,形成了在地经验、外部想象与混合生产并存的影像机制,推动华人移民史由文本记忆进入视觉记忆系统,并在跨媒介传播中持续生成新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华人移民史;侨乡电影;文化记忆;影视表达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178(2026)05-0073-12

## 引言

近代以来,随着“下南洋”移民潮的持续推进,大量华人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迁徙至东南亚各地谋生、定居并逐渐形成跨国分布的南洋华人社群。书信往来、汇款制度、口述记忆以及家族叙事等日常媒介,在维系移民与原乡关系的同时,也逐渐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情感结构的重要文化装置。从媒介史的角度来看,华人移民经验不仅存在于历史档案与文学书写之中,也较早进入影像表达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电影史上最早的本土电影之一,1927年上映的《新客》即以“下南洋”客工为核心叙事对象,通过影像方式呈现早期华人移民在南洋社会中的生存境遇。这一早期影像实践表明,华人移民并非进入现代电影时期后才被纳入叙事体系,而是在殖民时期的视觉文化生产中便已开启影像化表达。

**收稿日期**:2026-06-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科研专项资金支持项目(XMUMRF/2026-C17/IART/0030)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昌松,男,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影视研究。

**引用格式**:王昌松. 南洋华人移民史的影像转译:侨乡电影的文化记忆书写[J]. 中外交流研究(中英文),2026(5):73-8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进入当代语境,随着文化遗产意识与地方历史书写的强化,东南亚多地陆续建立以华人移民史为主题的博物馆与文化展馆,如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以及新加坡华人文化馆等。这些空间化、制度化的展示机制,将原本分散于私人记忆与家族叙事中的离散经验转化为可被观看与叙述的公共历史文本,使华人移民史逐渐由“生活经验”进入“文化展示”层面。尤其是近年来,华语电影创作中地方文化与历史记忆的再书写趋势日益显著,使“侨乡”这一文化空间不断被影像化、情感化与叙事化。2026 年 4 月 30 日上映的电影《给阿嬤的情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代表性作品。影片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叙事核心,通过跨越数十年的家族故事,将华人迁徙、离散经验与情感记忆重新编织为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影像叙事。

然而,与其仅将该片视为一部地方性亲情电影,不如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华人离散文化结构之中加以理解。事实上,从殖民时期《新客》开启的影像化尝试,到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南洋书写传统,再到当代华语电影中的侨乡叙事实践,华人移民经验始终在不同媒介之间不断流动、转换与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影像与历史之间形成了一种持续的互文关系,使“移民史”不仅作为历史事实存在,也作为文化记忆和媒介叙事不断被重新生产。基于此,本文以“影像转译”为分析视角,考察华人移民史如何在侨乡电影中被视觉化并转化为文化记忆。

## 一、从移民史到文化记忆:侨乡叙事的形成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王正毅,2023:76),东南亚地区逐渐被纳入世界经济网络之中。殖民政权为满足种植园开发、矿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力需求,推动了大规模跨区域人口流动。在此背景下,加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长期受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以及鸦片战争后经济衰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量居民被迫离开原乡,形成持续百余年的海外移民浪潮。其中,“下南洋”成为近代中国海外移民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之一(丁永学,2025)。在这一过程中,以广东潮汕、五邑地区、福建闽南以及海南等地为代表的侨乡社会,逐渐形成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人口迁徙网络。大批华人远赴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谋生,并在当地建立商业组织、宗乡祠堂与聚居社区,构成东南亚华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电影《给阿嬤的情书》所呈现的潮汕移民群体及其在泰国社会形成的文化空间,正与这一历史图景相呼应。这些跨越国界的移民网络不仅促进了经济联系,也持续维系着移民与原乡之间的情感纽带与文化认同。

然而,移民史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人口流动与经济迁徙的历史。对于多数移民而言,“下南洋”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上的离散,更意味着长期处于故乡与异乡之间的生存状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离乡谋生、返乡想象以及代际传承等经验,逐渐超越个体生命史的范畴,沉淀为侨乡社会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记忆及其生成机制。例如,梁海珍(2026)考察了广府文化在东南亚的历史传播过程及其本土化、融合与创新机制;吴宇烨(2026)则基于传播地理学"传播弧"理论,将侨批视为跨国动态媒介网络,分析其如何通过水客流动与书信实践跨越时空维系家族联系与情感秩序。也有研究关注东南亚华人生活空间的历史遗产,如李凤华与黄运南(2025)以新加坡布莱尔平原排屋为案例,分析土生华人住宅装饰中的中、马、欧多元文化交融特征,揭示其在移民背景下形成的跨文化混融审美与文化共生机制。这些研究从历史文化、传播媒介与物质空间等不同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侨乡文化并非静态的地域传统,而是在跨国流动中不断生成与重构的文化系统。

在这一理论脉络中,离散经验与"母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断裂或延续,而是一种持续的记忆再生产过程。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的"后记忆"(postmemory)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解释框架。该理论指出,未亲历历史创伤或重大迁徙经验的后代,通过家庭叙事、影像媒介与情感传递等方式,间接继承并想象性地重构过去,将其纳入自身情感结构之中(Hirsch,2012:29-53)。对于东南亚华人社会而言,"下南洋"所形成的迁徙经历、家族故事与故乡想象,正是在宗亲组织、方言群体、跨国家庭以及地方文化实践的共同作用下,逐渐沉淀为具有群体认同意义的集体记忆。进一步而言,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强调,群体对于过去的记忆并不会完全依赖亲历者的口述传承,而是通过文本、仪式、建筑、档案以及各种文化媒介被保存、传播与再生产(Assmann,2011:15-69)。在侨乡社会中,无论是侨批、祖屋、宗祠,还是地方传说、节庆活动与家族叙事,都构成了承载移民历史的重要记忆载体。这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华人移民的历史轨迹,也不断赋予后代理解祖辈经验的文化框架,使移民历史超越个体生命历程而获得持续流传的可能。

在侨乡语境中,这一机制尤为显著:移民经验往往并未随着第一代移民的逝去而消散,而是通过书信、口述、家族记忆以及地方文化实践不断被再生产,并转化为跨世代共享的情感与认同资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华人移民史逐渐由历史事实转化为文化记忆,并通过家族叙事、地方传说、华文文学以及影视影像等多种媒介不断被重构与传播,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离散特征的侨乡叙事传统。也正是这种由"后记忆"机制所支撑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使得侨乡经验不仅停留在历史层面,而且不断获得新的表达形式与媒介转译路径。基于此,下面将进一步讨论侨乡叙事如何在华文文学与华语电影中实现影像化与审美化转译,从而进入更具可视性的文化表达体系。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 二、华文文学中的南洋书写与离散记忆

在华人移民经验的文化转化过程中,华文文学长期承担着将历史离散经验转化为叙事表达的重要功能。早期南洋华文文学大多产生于第一代移民及侨民社会的现实经验之中,其书写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现实关怀。以新马地区华文报刊为例,不少华侨报业自创刊之初即设有文学副刊或文艺专栏,使新闻传播与文学创作形成紧密互动。陈庆妃在考察南侨机工相关新马华文文献时指出,早期华侨报业普遍将“报效祖国”视为重要使命,文学创作也因此承载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与家国意识(陈庆妃,2025)。笔者此前关于新马中文报业的研究同样发现,早期华文文学文本中普遍存在浓厚的思乡意识、回归意识与侨民意识,体现出移民群体对于原乡文化的持续情感投射(王昌松,2024:6)。这一阶段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移民经验的“见证性”(testimonial)特征,使文学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补充媒介。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作家的创作中,南洋书写逐渐由对移民生存经验的直接记录,转向对身份认同、文化归属与历史记忆的反思,离散经验也开始以更为复杂的叙事结构呈现出来。近年来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显示,这种转向不仅体现为主题变化,也涉及文学主体性的重构。例如,尹钒宇指出,“新南方写作”与华文文学研究虽然同样关注东南亚华文文学,但前者更多从中国文学视角出发进行“域外想象”,而后者则强调东南亚华文文学自身的在地性、主体性与多元中心立场,二者实际上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尹钒宇,2026)。这一讨论从侧面反映出,离散文学所关注的已不仅是“故乡在哪里”的问题,更是“如何理解自身所处位置”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在马华文学、新加坡华文文学以及其他海外华文书写传统中,“家乡”与“南洋”构成了一组持续存在张力的叙事轴线。一方面,故乡被不断想象为情感归属与文化根源;另一方面,南洋作为现实生活空间,又在不断重塑移民后代的身份结构与日常经验。这种双重空间结构,使得华文文学的移民叙事始终处于“在地性”与“离散性”之间的动态摇摆之中,并由此形成一种典型的跨地域书写传统。

在这一书写过程中,离散经验逐渐从个体层面的“漂泊叙事”上升为具有群体属性的文化记忆结构。无论是对祖辈迁徙路径的追溯,还是对家族历史的重构,华文文学都通过记忆、想象与叙事弥补历史断裂,使移民经验得以在文本中持续延展。事实上,这一以“迁移—殖民—地方化经验”为核心的叙事传统,在南洋华文文学中已形成相对清晰的谱系:如马来西亚作家张贵兴在《猴杯》《群象》等作品中,通过雨林空间与暴力历史书写,将华人垦殖经验转化为具有史诗性质的殖民寓言;黄锦树则在《乌暗暝》中不断反思离散主体的历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史失语与记忆断裂问题,使“无法被讲述的历史”成为叙事核心;新加坡作家英培安亦通过《骚动》等文本,以城市经验与现代性冲突的书写拓展华文文学对地方社会结构的表达维度。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南洋华文文学关于迁移经验、殖民历史与地方记忆的多重叙事传统。近年来受到广泛讨论的马华文学代表作《流俗地》则呈现出明显的路径调整。该作品以马来西亚华人底层社会为叙事对象,通过梦境书写将个体创伤、族群记忆与南洋殖民历史交织起来,并借助非线性叙事结构,将日常生活经验纳入更为复杂的记忆网络之中,从而构建出兼具地方性经验与历史寓言色彩的叙事空间(陈雅思等,2026)。

南洋华文文学不仅保存了华人移民历史的多重面貌,也为后续华语影视在影像层面对这一历史经验的再现与转译提供了重要的叙事资源与情感结构基础。正是在这一文学传统的支撑下,华人移民经验得以持续进入跨媒介的文化生产体系,并在电影等视觉媒介中获得新的表达形式与意义延展,从而为后续侨乡电影影像转译的研究奠定了叙事与理论基础。

## 三、华人移民史的影像转译

如果说华文文学通过叙事与语言将华人移民经验转化为可被理解的文化记忆,那么华语电影及侨乡影像则进一步完成了这一记忆的视觉化与情感化过程。在媒介转型的意义上,“影像转译”并不仅是对既有文本或历史材料的再现,而是一种对记忆结构、空间经验与情感秩序的重新组织方式。这里的“影像转译”特指影像媒介凭借其独有的符号系统与感知逻辑,对华人移民经验中的时间结构、空间经验与情感秩序进行系统性重组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影像转译”既是整合分散历史材料的结构装置,也是激发普遍情感共鸣的生成机制。它通过重构视觉秩序,使移民历史不仅“被看见”,更在情感结构上“被感知”,由此在媒介层面完成文化记忆的视觉化与公共化。具体而言,其分析维度包括:其一,语法维度的符号转换。影像转译将文字或口述的线性叙事,经由镜头景别、场面调度与蒙太奇修辞,转化为一套具有新的逻辑关系的视听语法,从而改变叙事的详略、因果与节奏。其二,空间维度的经验重构。它超越地理位置的简单对照,通过景观构图、声音设计与画外空间的营造,将离散、漂泊等抽象心理状态具象化为可沉浸的“情感地景”,使空间本身成为叙事主体。其三,接受维度的情感动员。影像转译的最终指向是公共化。它以细腻的视听语言将私人化的家族记忆从封闭文本中解放,转化为可通感的视觉符号,使观众在直观观看中与移民经验产生共情,从而实现个体记忆向公共文化记忆的跨越。

这一转译实践并非当代侨乡影像所独有,而是具有较长的历史延续性。1927 年上映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电影《新客》以“下南洋”客工群体为叙事核心,将华人移民经验首次纳入视觉文化生产体系(王昌松,2018)。尽管其影像技术与叙事形式仍处于早期阶段,但该片具有重要的历史标志意义:移民历史开始从书写与口述体系进入影像表达结构之中。此后,在殖民时期至战后华语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南洋社会逐渐成为华语影像的重要叙事空间,华人劳工、侨民生活与跨国流动经验不断被纳入银幕表达,使“移民经验”逐渐形成可被重复编码的影像母题。

进入 20 世纪中后期,华人移民经验在华语电影中的呈现进一步复杂化,并在不同区域影像生产之间形成互动结构。一方面,香港电影工业在全球华语文化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作品不断吸纳离散经验与跨国流动叙事,使“离散”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想象结构;另一方面,新马及东南亚本土影像生产也逐渐兴起,通过电视与电影媒介重构本地华人社会经验,使侨乡空间在视觉表达中获得更为日常化与地方化的呈现。在这一阶段的影像实践中,“南洋”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移民目的地,而成为承载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的复合性叙事空间。

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影像化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区分影像生产主体的不同位置性。总体而言,侨乡影像的生成主要涉及两类创作主体。第一类为生长于南洋本土的华人后代,他们在侨乡社会内部生活与成长,其影像创作往往基于对地方经验的直接感知与日常观察。这类创作者更倾向于从家庭结构、地方空间与社区关系出发,呈现移民历史在日常生活中的延续形态,其影像实践具有较强的“在地性”与经验嵌入特征。例如,在新马本土电影与电视影像中,以“新村”[①](New Village)为代表的空间叙事仍频繁出现,这一具有殖民历史遗留特征的居住形态,在当代影像中被不断重新编码为华人社会记忆与族群经验的象征空间,从而使移民历史在日常生活结构中持续可见。第二类则来自南洋之外的华语文化空间,主要包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其他海外华语地区的创作者。这一群体与侨乡社会之间保持一定的经验距离,其对华人移民历史的理解更多依赖历史文本、文化想象与跨媒介传播,因此其影像创作往往呈现为一种“外在视角”的叙事结构,更强调移民历史中的象征意义、情感母题与结构性叙事,如乡愁、返乡、家族记忆与离散身份等。在这一脉络中,许鞍华的《投奔怒海》通过历史与政治动荡中的流动经验,呈现出具有典型“离散叙事”特征的影像结构,从而构成外部视角介入移民经验的重要案例。

这两种不同位置性的影像生产机制,使华人移民史的视觉表达呈现出复杂的张力结构:在地创作强化了移民经验的日常性与地方性,使侨乡文化得以在生活实践中持续再生

① 新村是马来西亚华人聚居的村落,形成于 1950 年代,是马来亚英国殖民地政府在长达十二年的紧急状态中设立的一系列华人集中定居点。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产;外部创作则通过跨地域想象,将侨乡经验纳入更广阔的华语文化叙事体系之中,从而推动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再编码与再意义化。正是在这种双重机制的交织作用下,侨乡电影并非单一视角的历史再现,而是一种多重文化位置共同参与的记忆生产过程。以《给阿嬤的情书》为例,电影对侨乡历史记忆的转译,并非停留于侨批文化的主题再现,而是通过多重影像语言完成了历史经验的视觉化重构。

首先,影片以书信作为核心叙事媒介,将侨批由原本具有档案性质的文字文本转化为具有情感流动性的影像文本。书信的诵读、手写字迹的特写,以及信件与人物回忆之间的交叉剪辑,使静态文献获得了时间性与主体性,历史因此不再只是被保存的史料,而成为跨越时空持续发生的情感交流。其次,影片不断在南洋与潮汕侨乡之间建立跨空间的镜头联系,并在两地生活场景之间运用平行蒙太奇,将原本分离的地理空间重新组织为同一条迁徙记忆链条。与此同时,影片大量采用祖孙之间的对话、长辈讲述往事以及年轻一代赴泰寻亲等代际互动场景,使历史记忆由个人回忆转化为家庭内部不断传递的文化实践。历史因此不是单向度的再现,而是在影像叙事中不断被讲述、被理解和被重新赋予意义。正是在书信影像、跨空间镜头与代际叙事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电影完成了从侨批文献到视听文本、从地方历史到跨文化记忆的跨媒介转译,使侨乡文化不仅得以保存,而且在新的传播语境中实现了持续性的再生产与再意义化。

总体而言,这类作品的影像生产机制,使华人移民史的视觉表达呈现出复杂的张力结构。在地创作强化了移民经验的日常性与地方性,使侨乡文化得以在生活实践中持续再生产;外部创作则通过跨地域想象,将侨乡经验纳入更广阔的华语文化叙事体系之中,从而推动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再编码与再意义化。正是在多重文化位置的交织中,侨乡电影并非单一视角的历史再现,而是一种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文化记忆生产机制。

## 四、侨乡电影的文化记忆建构

如果说华人移民史的影像转译解决的是历史经验如何进入电影的问题,那么侨乡电影的文化意义则进一步体现为其如何通过影像叙事将个体经历、家族故事与地方历史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并非对过去的被动保存,而是在持续的叙述、传播与再阐释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意义结构。要理解侨乡电影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首先需要厘清文化记忆理论的逻辑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适用于影像分析的操作框架。

从文化记忆理论基础来看,无论是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强调的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性(Coser,1992:1-36),还是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记忆场所”概念(Nora,1989),都指向一个共同判断:记忆并非自然保存的历史残余,而是在特定社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会结构与文化实践中不断被组织与再生产的结果。在中国学术语境中,文化记忆研究同样强调记忆的建构性与媒介性特征。邱凌与臧千茗(2025)认为,文化记忆与影像重构依托于叙事层面的意义内化、符号系统的媒介化组织,以及基于个体经验的情感共鸣结构,从而实现文化内容在跨语境传播中的可理解性与认同生成。李波与傅铄然(2025)则从传统文化转化的角度出发,提出文化解码、元素提取与重新编码输出构成影视创作中实现文化转译与再生产的关键路径。这些讨论表明,国内学界已将文化记忆研究拓展至媒介研究、文学叙事与地方社会研究等多个领域。对于东南亚华人而言,移民、离散、战争与殖民经验往往跨越数代,其文化记忆既依赖侨批、族谱、宗祠等历史媒介得以保存,又通过家庭讲述、返乡实践与影视传播不断获得新的诠释。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视听媒介,其记忆建构并非简单的文字记录或空间标记,而是同时涉及叙事组织、视觉呈现与接受过程的复杂活动。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可提炼出三个适用于影像分析的具体维度:其一,空间维度的记忆锚定,对应诺拉"记忆场所"的逻辑,考察电影如何通过场景建构将历史经验附着于可感知的地理空间之上;其二,代际维度的记忆传递,对应阿斯曼文化记忆的跨代传承机制,考察电影如何通过家庭叙事将原本属于特定时代的历史经验传递给后代;其三,身份维度的记忆协商,考察电影如何在离散语境中处理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使记忆成为跨地域认同生成的媒介。这三个维度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共同构成侨乡电影文化记忆建构的分析框架:空间提供记忆的载体,代际提供记忆的延续机制,身份则使记忆从"过去的遗留物"转化为"当下的认同资源"。

首先,就空间维度而言,侨乡电影通过影像重构将现实中的侨乡空间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之场"。长期以来,侨乡研究普遍关注祖屋、宗祠、侨批馆、港口、骑楼街区以及华人聚居区等空间在移民历史中的意义。这些空间不仅记录着人口迁徙的历史轨迹,也承载着族群认同与地方文化的延续。在电影叙事中,这些现实空间被重新组织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场所"。《给阿嬤的情书》中连接潮汕与泰国的跨国家族空间,并非单纯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存在,而是通过书信、返乡、家庭记忆等叙事机制,将分散于不同国家的离散经验重新组织为具有情感连续性的记忆空间。影片中的潮汕与泰国并非两个彼此分隔的地点,而是在侨批、家族影像与代际交流的作用下形成一个跨地域的"记忆场所"。类似的空间记忆机制也体现在2002年上映的印尼电影《甲必丹娘惹》(原名 *Ca-bau-kan*)之中。影片刻画了殖民时期巴达维亚华人家族的兴衰,呈现印尼华人的历史处境与身份认同。片中的巴达维亚并非单纯的殖民城市,而是由贸易、族群互动与文化混融共同形成的离散空间。华人身份在这一空间中既受到殖民制度、族群等级与政治环境的影响,也通过家庭关系、商业活动与文化实践持续维系。2005年上映的泰国电影《锡矿山》(原名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Maha'lai Muang Rae*)则提供了另一种南洋华人移民记忆的表达方式。影片以泰国南部锡矿开发为背景,将华工、地方社会与经济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通过劳动空间、社区生活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呈现华人移民参与东南亚区域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给阿嬤的情书》以家庭记忆为核心不同,《锡矿山》更强调劳动经验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其影像中的矿区既是经济生产空间,也是族群记忆形成的场域。在这里,华人移民并非仅作为"离开故乡的人"存在,而是在新的土地上通过劳动、社区建设和社会互动逐渐形成地方归属。因此,影片突破了传统"原乡—异乡"的二元叙事,将离散经验重新理解为一种持续生成地方认同的过程。尽管这些作品在叙事策略、生产背景与美学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华人跨国迁徙、离散生活与族群记忆等议题,共同构成南洋及海外华人移民历史的影像谱系。

其次,侨乡电影承担着文化记忆代际传递的重要功能。相较于以国家叙事或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宏观历史书写,这类影视作品往往从家庭关系、亲缘网络与个体命运切入,通过祖辈、父辈与后代之间的代际联系,将宏大的历史进程转化为具体而可感的人生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家庭不仅是叙事展开的基本单位,更成为文化记忆得以保存、传递与再生产的重要媒介。通过家庭内部的讲述、追忆与寻根,原本属于特定时代的移民经历、战争创伤与离散记忆得以跨越代际边界,进入后代的认知与情感结构之中。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东南亚本土创作的华语电影创作逐渐由宏观历史叙事转向个体经验与身份反思,文化记忆的书写更多见于艺术电影与作者电影之中。马来西亚华裔导演张吉安的创作具有代表性。《南巫》(2020 年)以 20 世纪 80 年代马泰边境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政治氛围为背景,隐约触及马来亚共产党历史、泉州公主传说及边境社会的集体记忆。受马华新村文学影响而创作的《五月雪》(2023 年)则进一步将侨乡电影的文化记忆机制推进至历史创伤与后记忆生成的层面。影片并未采用传统历史电影中以事件重现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而是通过戏班后人与 1969 年的"五一三事件"[①]之间跨越时间的关系,将个人生命经验置于集体历史创伤的延续过程中,探讨历史记忆如何在沉默、遗忘与重新讲述之间不断被激活。对于马华社会而言,"五一三事件"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历史事件,更是一段长期存在于家庭叙事、地方记忆与族群经验中的复杂历史。由于相关记忆长期处于私人化、碎片化甚至沉默化状态,其传播并非主要依靠官方历史书写,而更多依赖文学、口述、家庭记忆以及文化艺术形式进行保存。因此,《五月雪》所呈现的并非单纯的历史再现,而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记忆生产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侨乡电影所建构的不仅是关于过去的历

① 五一三事件,指 1969 年 5 月 13 日发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严重社会骚乱。官方将其界定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学界则多从族群、经济与政治等多重因素加以解释。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史图景,更是一种跨代际的记忆传承机制。从文化记忆理论来看,影片中的戏班、舞台空间与华人影院构成了重要的“记忆场所”。戏班不仅是传统表演空间,更是承载华人地方文化、集体情感与历史经验的重要媒介。在影片中,戏曲表演与历史创伤并置,使传统文化形式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记忆通道。戏班后人的身体经验、家庭关系以及对过去的追寻,使宏观历史事件转化为具体的人生经验,从而突破以国家政治叙事为中心的历史表达模式。无论是战争、迁徙还是族群创伤,历史都并非停留在过去,而是在影像叙事的不断重述中转化为后代理解自身文化身份与历史位置的重要资源。

再次,就身份维度而言,侨乡电影通过离散叙事建构跨地域的文化认同。上述空间锚定与代际传递最终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记忆经由影像被保存和传承,它究竟服务于怎样的身份建构?华人移民史所形成的并非单一民族叙事,而是一种长期处于原乡与居住地之间的文化经验。早期影像叙事将“原乡—南洋”的二元结构固定为华人集体记忆的基础框架。进入当代语境后,侨乡电影的离散叙事逐渐从历史再现转向身份协商与文化混融的表达。例如,2014年上映的马来西亚中文电影《一路有你》通过跨族婚姻与家庭代际冲突,呈现华人文化在马来西亚多族群国家结构中的再定位过程。2016年上映的另一部马来西亚电影《辉煌年代》则借助国家足球队的集体叙事,将华人、马来人与印度裔纳入同一国家想象之中,使华人身份从“移民后裔”逐渐转向“国家公民”的位置。虽然这两部作品不能严格归入侨乡电影,但这类影视作品说明,“华人性”不再是封闭的文化属性,而是在国家语境中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关系性存在。马来西亚电影学者邱玉清在探讨当下东南亚华语电影时提出,即使影片以华语进行创作,创作者与角色仍需不断协商其作为东南亚国民身份与华人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因此国家归属与文化归属之间的张力始终贯穿其中(Khoo,2009)。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给阿嬤的情书》通过侨批与跨代叙事,将离散经验转化为情感化的文化记忆,重构了“原乡—南洋”的记忆空间,但它所做的并非简单回归“原乡”认同,而是将这一二元结构置于当代跨国家庭的情感网络之中,使其成为身份协商的动态场域,而非静态的文化归属。

南洋侨乡电影的文化意义并不局限于历史再现本身,更在于其通过空间书写、代际叙事与身份表达等多重路径,将移民历史转化为具有公共传播能力的文化记忆。空间使离散经验获得可感知的影像载体,代际使原本属于特定时代的历史经验得以跨越时间边界进入后代的认知结构,身份则使记忆从“过去的遗留”转化为“当下的认同资源”,三者共同构成侨乡电影文化记忆建构的完整机制。侨乡电影使原本散落于地方社会、家族档案、侨批文献与口述传统中的历史经验进入大众视觉文化领域,并在持续的观看与传播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侨乡电影既是华人移民史的影像记录,也是文化记忆持续生成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重要实践场域。

## 结语

本文围绕侨乡电影这一文化现象,考察华人离散经验如何在文学与影像媒介之间不断被重构、再叙事与重新记忆化。通过对移民史、华文文学书写传统与华语影像实践的多层梳理,本文试图揭示华人移民经验并非一个已完成的历史对象,而是一个在跨媒介传播中持续生成的文化记忆系统。

从历史结构来看,“下南洋”所代表的华人跨国迁徙,并不仅是人口流动意义上的社会现象,而是在殖民扩张与全球资本体系重组背景下形成的长期历史进程。移民经验由此超越个体生命史,逐渐沉淀为一种具有群体属性的历史记忆资源。在华文文学层面,移民经验经历了从“见证性书写”到“记忆性书写”的转变。随着代际更替与文化语境变化,南洋书写逐渐转向对身份认同、文化归属与历史想象的反思,使“南洋”从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情感结构与记忆想象的象征性场域。华文文学保存了移民历史的经验形态,通过叙事化机制不断重构其意义结构,从而为后续影像转译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影像转译”概念,以解释华人移民史在华语电影中的再媒介化过程。通过当代侨乡电影对地方文化与家族记忆的影像化重构,可以看到移民经验逐渐从文本与口述系统进入视觉文化生产体系。影像不再仅仅承担历史再现功能,而成为一种重组时间、空间与情感结构的文化机制,使离散经验得以以可见、可感的方式进入公共文化领域。

侨乡电影的影像转译过程并非由单一主体完成,而是由不同文化位置的创作者共同参与的复杂建构过程。侨乡电影所建构的并非封闭的历史再现系统,而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记忆机制。它通过跨媒介转译,使华人移民经验在文学、影像与日常文化实践之间不断流动,并在不同代际与文化语境中被重新理解与再阐释。移民历史不再作为固定对象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持续生成的记忆结构嵌入当代文化生产之中。华人移民史的影像转译不仅揭示了侨乡电影的叙事逻辑与美学特征,也进一步表明,文化记忆并非对过去的被动保存,而是一种持续进行的再生产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离散经验得以在跨媒介体系中不断被激活与重写,从而使华人移民历史在当代语境中持续获得新的解释空间与意义维度。

**参考文献:**

Assmann, J. 2011.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ser, L. A. 1992.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Hirsch, M. 2012.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hoo, G. C. 2009. What Is Diasporic Chinese Cinema in Southeast Asia? [J].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1): 69-71.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Lieux de Mémoire [J]. *Representations* (26): 7-24.

陈庆妃. 2025. 新马华文文学视域中的南侨机工书写[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49-161.

陈雅思,朱文斌. 2026. 论黎紫书《流俗地》的不可靠叙述[J]. 华文文学(2): 27-37.

丁永学. 2025. 近代移民史研究:档案资料中的民族迁徙与社会融合[J]. 黑龙江史志(8): 150-154.

李波,傅铄然. 2025.《只此青绿》的文化记忆机制:从文物遗迹到舞剧电影的创造性转化[J]. 电影评介(19): 65-70.

李凤华,黄运南. 2025. 交融与共生:新加坡土生华人住宅的装饰特征研究——以新加坡布莱尔平原地区排屋为例[J]. 创意设计源(4): 69-73.

梁海珍. 2026. 广府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研究——以粤语、粤菜、粤剧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17): 23-28.

邱凌,臧千茗. 2025. 文化记忆与影像重构:鲁剧传承与创新齐鲁文化的双重路径[J]. 现代视听(11): 11-15.

王昌松. 2018. 马来西亚中文剧情片叙事的文化身份[J]. 当代电影(6): 75-79.

王昌松. 2024. 新马华文新闻出版与福建软实力[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王正毅. 2023. 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吴宇烨. 2026. "传播之弧":晚清侨批的意义网络建构与南洋移民的认同流变[J]. 新闻界(4): 71-83.

尹钒宇. 2026. 论"新南方写作"与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J]. 华文文学(1): 41-46.

# The Cinematic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Nanyang: Representing Cultural Memory in Qiaoxiang Cinema

*WANG Changsong*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Selangor Sepang*, *Malaysia* 43900)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diasporic experienc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Nanyang has gradually been transformed from historical fact into cultural memory 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narrated and reconstructed i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inema. Taking "cinematic reinterpretation" as its core concept and drawing on cultural memory theory and film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Qiaoxiang cinema transforms migration experience into perceptible visual expression through spatial visu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ffective structures, and symbolic recod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through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creators situat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positions, Qiaoxiang cinema has developed a cinematic mechanism in which local experience, external imagination, and hybrid production coexist. This mechanism enabl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move from textual memory into a system of visual memory and to continuously generate new cultural meanings through cross-media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Qiaoxiang cinema; cultural memory; cinematic expression

责任编校:崔守奎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